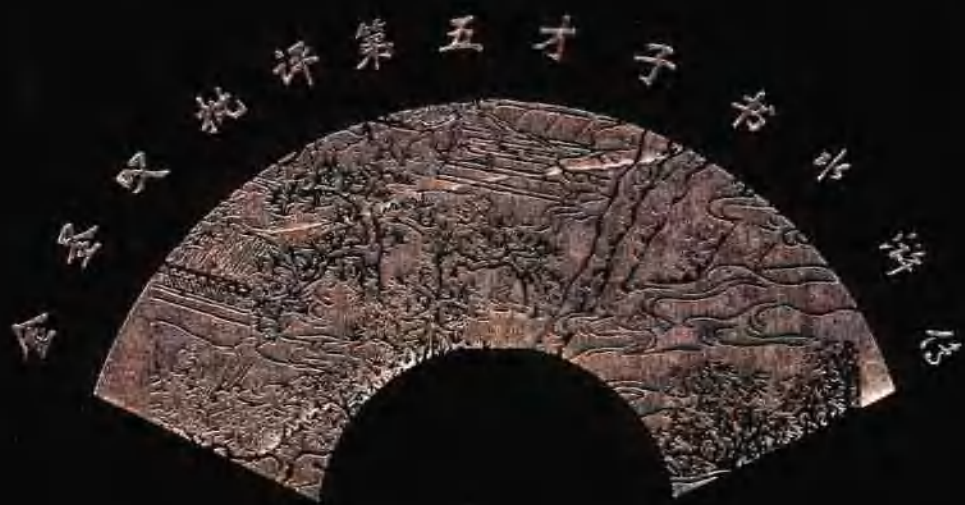


金圣叹批评
第五才子书
水浒传

上卷

施耐庵 原著
金圣叹 评点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张 玮

封面设计：陈武军



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

施耐庵 原著
金圣叹 评点

水浒传

上卷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编校说明

一、本书为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即金圣叹评本《水浒传》（简称“金评本”）的整理普及本，并附录百二十回本《水浒传》之后五十回，均以简体字横排出版。

二、本书点校金评本部分以明崇禎间贯华堂本为底本，附录部分以明末袁无涯刻本为底本，均校以明容与堂刻百回本，并参校了各出版社的《水浒传》排印本。对诸本择善而从，明显的错讹之处则予以改正。

三、底本即贯华堂本评语卷前有读法，正文中有回前总评，双行小字夹批，眉批。本书编排时总评及夹批仍置于原处，夹批改双行为单行，眉批移入正文相应的段落，句子后，以“眉批”标明。评语均以红色字体区别于正文。

四、金评本实为百回本（或百二十回本）《水浒传》的前七十一回，其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，又将原本第一回移作楔子，第二回移作第一回，故成七十回。本书编排时，将百二十回本《水浒传》之七十一至一百二十回文字附录于后，其中七十一回与金评本之第七十回文字大体相同，但金评本加入卢俊义惊恶梦一段文字，又删去众英雄对天盟誓前一段骈文，两者回目亦有差别，故本书两存之。

序一

原夫书契之作，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于结绳，而其盛极而为六经。其垂简裁笔者，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。有其权而知其故，则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是故《易》者，导之使为善也；《礼》者，坊之不为恶也；《书》者，纵以尽天运之变；《诗》者，衡以会人情之萌也。故《易》之为书，行也；《礼》之为书，止也；《书》之为书，可畏；《诗》之为书，可玩也。故曰《易》网而《礼》方，《书》久而《诗》大。又曰《易》不赏而民劝，《礼》不怒而民远，《书》为庙外之几筵，《诗》为未朝之明章也。若有《易》而可以无《书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书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书》而可以无《诗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诗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书》有《诗》而可以无《礼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礼》也。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，则知《易》与《书》与《诗》与《礼》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废也。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其权，而后作《易》，之后又欲作《书》，又欲作《诗》，又欲作《礼》，咸得奋笔而遂为之，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。

无圣人之位，则无其权；无其权，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无圣人之位，而有圣人之德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，而不能已于作，此《春秋》是也。顾仲尼必曰：“知我者，其推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推《春秋》乎？”斯其故何哉？知我推《春秋》者，《春秋》一书，以天自处学《易》，以事系日学《书》，罗列与国学《诗》，扬善惩恶掌《礼》；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，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，以合为一书，则是未尝作也。夫未尝作者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推《春秋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《春秋》，而后世巧言之徒，无不纷纷以作伪纷纷以作既久，谎言无所不有；君读之而彷徨于上，民读之而惑乱于下，势必至于拉杂焚烧，偶连六经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终不已于作，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责者也。或问曰：然则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无罪也。仲尼必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，于是因史成经，不别立文，而但于首末书“存正其”若曰，其旧则诸侯之书也，其新则天子之书也。假诸侯之书，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，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。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于诸侯，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于庶人哉！是故作书，圣人之事也。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作书，圣人而天子之事也。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何也？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；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。破道与治，是横议也。横议，则乌得不烧？横议之人，则乌得不诛！

故秦人烧书之举，非自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，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，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。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，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；实无其德，则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尽烧矣。故并烧圣经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烧书，始皇之所也。无何汉兴，又人求遗书。当

时在廷诸臣，以献书进者多有。于是四方功名之士，无不不言有书。一时得书之多，反更多于未烧之日。今天自古至今，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，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！烧书，而天下无书；天下无书，圣人之书所以存也。求书，而天下有书；天下有书，圣人之书

所以亡也。烧书，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。求书，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。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！明圣人之教者，其书有之；叛圣人之教者，其书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书有之；犯天子之令者，其书亦有之。夫咸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，犹在所不许。何则？恶其破道与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？原其由来，实推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推著，经书既久，才思溢矣。

夫应诏固须美言，自娱何所不可？刻画雕镂，诋讟圣贤，笔墨既酣，胡可忍也？是故，乱民必诛，而“游侠”立传；市偿辱人，而“货殖”名篇。意在穷奇极变，皇情剑心呕血，所谓上薄苍天，下彻黄泉，不辱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当其初时，犹尚私之于下，彼此传观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始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见之，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。夫叛教犯令之书，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！其作者，惊相告也；其读者，惊相告也。惊告之后，转相祖述，而无有一人不作，无有一人不读也。于是而圣人之遗经，一二篇而已；诸家之书，坏牛折轴不能载，连陌复室不能度也。天子之教诏，上首之而已；诸家之书，非纛纛不为其题，非金玉不为其签也。积渐至于今日，祸且不可复言。民不知偷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；民不知淫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；民不知诈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；民不知乱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。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，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者，不过犹其附会经文，示民以杂；测量治术，示民以明。示民以杂，民则难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则难诳。

故蓬斯之破道与治，是为横议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耳；非真有所大违于圣经，极害于王治也。而然且如此。若夫今日之书，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，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！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，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。而满首罪魁，则汉人诏求遗书，实开之端。故曰烧书之祸烈，求书之祸尤烈也。烧书之祸，祸在并烧圣经。圣经烧，而民不兴于善，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求书之祸，祸在并行私书。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，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烧圣经，而圣经终大威于后世，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。若行私书，而私书遂至实害蔓延不可复救，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。呜呼！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听之则不可，禁之则不能，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？曰：吾闻之，圣人之作书也以德，古人之作书也才。知圣人之作书以德，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，读者贵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拘拘于字句，以为从事于经学也。知古人之作书以才，则知诸家皆鼓舞其善华，览者贵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拮据齿牙以为激言之微中。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《易》之下作《易传》，《书》之下作《书传》，《诗》之下作《诗传》，《礼》之下作《礼传》，《春秋》之下作《春秋传》也。何也？诚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惧章句之未安，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。于诸家之书而诚能举其善华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《庄》之后作《广庄》，《骚》之后作《续骚》，史之后作《后史》，《诗》之后作《拟诗》，卿官之后作《高卿官》也。何也？诚疑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袭，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。夫扬汤而不得冷，固不加礼莫逆亲；覆影而更愈多，则不如教之勿趋也。恶人作书，而示之以圣人之德，与夫古人之才者，盖为碍于圣门者难为言。观于才于之林者，难为文，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。然圣人之德，实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则非于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犹夫人之能事；犹夫人之能事，则庶几于小子不拯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也者，世不相证，人不相及。庄周有庄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马迁有马迁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露而至于破屋施有施屋施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才之为言材也。故云胡日之妾，其初本于破核分莩；于破核分莩之时，具有凌云蔽日之势；于凌云蔽日之时，不出破核分莩之势，此所谓材之说也。又才之为言裁也。有全器在手，无全锦在目；无全衣在心；见其缝，知其袖；见其襟，知其被也。大宛胡非蒲，而得则非裁；然左右相就，前后相合，浑然各异，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谓裁之说也。今天下之人，疑知有才者始能构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手构思以后；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，而不知古去用才乃绕手立局以

后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；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。此苟且与慎重之辨也。言有才始能构思、立局、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，外未尝矜式于珠玉，内未尝经营于惨淡，偶然放笔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，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助于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、构思以后，乃至绕乎布局、琢句、安字以前以后者，此其人，笔有左右，要有正反；用左笔不安换右笔，用右笔不安换左笔；用正墨不现换反墨；用反墨不现换正墨；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。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圣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神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，则是其纸上无字、无句、无局、无思者也。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，其心头眼底乃昏昏有思，乃栩栩有局，乃凛凛有句，而烨烨有字，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，才以绕其前，才以绕其后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。故依世人之所谓才，则是文成于易者，才子也；依古人之所谓才，则必文成于难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易之说，则是迅疾挥扫，裨气扬扬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难之说，则必心绝气尽，而犹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，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书，是皆所谓心绝气尽，而犹死人，然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得成一书者也。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复具论。若夫施耐庵之书，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，而犹死人，而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始得成书。夫而后知古人作书，其非苟且也者。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，庞然欲笔，然则其人真不足诛，其书真不足烧也。夫身为他人，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，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篇，圣分而节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，已作之书一旦尽废，是则圣叹靡清天下之功，为更奇于秦人之火。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概如此。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几同关之瓦砾也。

序二

观物者审名，论人者辨志。施耐庵传宋江，而题其书曰《水浒传》，恶之至，进之至，不与同中国也。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，乃谬加以“忠义”之名。呜呼！忠义而在《水浒传》乎哉？忠者，事上之盛节也；义者，使下之大经也。忠以事其上，义以使其下，斯宰相之材也。忠者，与人之大道也；义者，处己之善物也。忠以与乎人，义以处乎己，则圣贤之徒也。若夫耐庵所云“水浒传”也者，王上之流则有宋，又在水外则曰浒，远之也。远之也者，天下之凶物，天下之所共击也；天下之恶物，天下之所共弃也。若使忠义而在水浒，忠义为天下之凶物、恶物乎哉！且水浒传有忠义，国家无忠义耶？夫君则犹是君也，臣则犹是臣也，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？此虽恶其似之辞，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。父则犹是父也，子则犹是子也，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？

此虽恶其子之辞，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义于《水浒传》者，斯人必有想其君父之心，不可以不察也。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则何为而至于水浒传乎？其幼，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；其壮，皆杀人夺货之行也；其后，皆敲朴剜削之余也；其卒，皆揭竿斩木之贼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诛之，则千人亦惧，万人亦惧者也。加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？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，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，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？耐庵有忧之，于是奋笔作传，题曰《水浒传》，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，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，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而又妄以忠义于之，是则将成者而应将为劝耶？豺狼虎豹而有祥瑞威风之日，杀人夺货而有伯夷、颜渊之誉，剜削之余而有上流情节之蒙，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，既已名实抵牾，是非乖错，至于如此之极，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，而推宋江等一百八人，以为高山景行，其心向往者哉！是故由耐庵之《水浒传》言之，则如史氏之有《梅柢》是也，备书其外之权臣，备书其内之凶恶，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。由今日之《忠义水浒传》言之，则直与宋江之贼人伙，无用之说撞箠无以异也。无恶不归朝廷，无美不归绿林，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，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。呜呼！名者，物之表也；志者，人之表也。名之不辨，吾以疑其书也；志之不端，吾以疑其人也。削忠义而仍《水浒传》者，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，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。虽在裨官，有当世之忧焉。后世之恭慎君子，苟能明吾之志，庶几不易吾言矣哉！

序三

施耐庵《水滸》正传七十卷，又楔子一卷，原序一篇亦作一卷，共七十二卷。余与汝释弓。序曰，吾年十岁，方人多塾，随例读《大学》，《中庸》，《论语》，《孟子》等书，意悟如也。每与同塾儿尚作是语：“不知习此将何为者？”又窥见夫人彻夜吟诵，其意乐甚，殊不知其何所得乐？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？其中皆何所言，不雷同耶？如是之事，总未能明于心。明年十一岁，身体时时有小病，病作，辄得告假出塾。吾既不好弄，大人又禁不许弄，仍以书为消息而已。吾最初得见者，是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次之，则见屈子《离骚》。次之，则见太史公《史记》。次之，则见俗本《水滸传》。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。《离骚》苦多生字，好之而不能甚解，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。《法华经》，《史记》解处为多，然而胆未坚刚，终亦不能常读。

其无昼无夜不在怀抱者，吾于《水滸传》可谓无间然矣。吾每见今世之文兄，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，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，此皆大惜。夫儿子十岁，神智生矣，不纵其读一切书，且有他好，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，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。汝昔五岁时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，今年始十岁，便以此书相授者，非过有所宠爱，或者教授之道当如是也。吾犹自记十一岁读《水滸》后，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。吾实何曾得见一书，心知其然，则看之耳。

然就今思之，诚不谬矣。天下之文章，无有出《水滸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学者诚能澄怀格物，发皇文章，岂不一代文物之林？然但能善读《水滸》，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。《水滸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大有其性情，大有其气质，大有其形状，大有其声口。夫以一手而画数面，则将有兄弟之形；一口吹数声，斯不免再映也。施耐庵以一心所运，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，无他，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，斯以一笔而写百万人，固不以为难也。格物亦有法，汝应知之。格物之法，以忠恕为门。何谓忠？天下因缘生法，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，天下自然，无法不忠。火亦忠，眼亦忠，故吾之见忠；钟忠，耳忠，故闻无不忠。吾既忠，则人亦忠，盗贼亦忠，犬鼠亦忠。盗贼犬鼠无不忠者，所谓恕也。夫然后物格，夫然后能尽人之性，而可以赞化育，参天地。今世之人，吾知之，是先不知因缘生法。

不知因缘生法，则不知忠。不知忠，焉知恕哉？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。谓其妻曰：肩挑担也，日犹日也，鼻犹鼻，口犹口，而夫儿非小儿，小儿非大儿者，何故？而不计则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。夫不知子，问之妻。夫妻因座，是生其子。天下之忠，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；天下之忠，无有过于其子之而者。市知其理，而睹天下人之面，察天下夫妻之事，彼方面不同，岂不甚宜哉！忠恕，量万物之斗斛也。因缘生法，裁世界之刀尺也。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，右手持如是刀尺，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，气质，形状，声口者，是犹小试其端也。若其文章，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，

又何异哉！吾既喜读《水滸》，十二岁便得晋华堂所藏古本，吾日夜手抄，謄自评释，历四五六七八月，而其事方竣；即今此不迟已。如此者，非吾有读《水滸》之法；若《水滸》固日为读一切书之法矣。吾旧闻有人言：庄生之文放浪，《史记》之文雄奇，始亦以之

为然，至是忽哑然其笑。古今之人，以智语辩，真可谓一无所知，徒令小北脸痛耳！夫庄生之文，何尝放浪？《史记》之文，何尝雄奇？彼始不知庄生之所云，而徒见其忽言化鱼，忽言解牛，寻之不得其端，则以为放浪；徒见《史记》所记管叔、蔡叔之事，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，捐金重义为多，则以为雄奇也。若诚以吾读《水滸》之法读之，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，《史记》之文亦精严。不至惟是而已，盖天下之书，诚欲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，即无有不精严者。何谓之精严？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是也。夫以庄生之文杂之《史记》，不似《史记》，以《史记》之文杂之庄生，不似庄生者，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，《史记》述其事迹而已。其志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有固然者，毋足怪也。

若复置其中之所论，而直取其文心，则惟庄生能作《史记》，惟子长能作《庄子》。吾悉乎知之，吾读《水滸》而知之矣。夫文章小道，必有可观，吾党斐然，尚须裁夺。古来至圣大贤，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。只如《论语》一书，岂非仲尼之微言，清静之篇书？然而善论道者论道，善论文者论文，吾尝观其制作，又何其其妙也！《学而》一章，三唱“不亦”，叹“觚”之篇，有四“觚”字，余者一“不”，两“哉”而已。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”，其文交互而成。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其法传接而出。

“山”“水”“动”“静”“乐”“寿”，譬禁树之对生。“子路问师而行”，如晨鼓之顿发。其他不可悉数，约略皆佳构也。彼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，各以其书独步万年，万年之人，莫不叹其何处得来。若自吾观之，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？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者也。《水滸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其人不出绿林，其事不出劫杀，失教丧心，诚不可训。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，伸其神理者，盖此书七十回，数十万言，可谓多矣，而举其神理，正如《论语》之一节两节，泐然以清，泓然以明，轩然以轻，澗然以新，彼岂非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之流哉！不然，何以有此？如必欲苟其形迹，则夫十五《国风》，淫污居半；《春秋》所书，就夺十九。不闻恶神奸而弃禹桀，憎《桀纣》而诛倚相，此理至明，亦易晓矣。嗟乎！人生十岁，耳目渐开，如日在东，光明发辉。如此书，在即欲禁没不见，亦岂可得？今知不可相禁，而反出其旧所批评，脱然授之于手也。夫固以为《水滸》之文精严，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。汝真能善得此法，而明年科场偶中，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，其易果如破竹也者，夫而后叹施耐庵《水滸传》真为文章之总持。

不然，而犹如常书之泛览者而已。是不惟负施耐庵，亦殊负吾。汝试思文，吾知之何其不郁郁哉！

宣统帝祚十四年二月十五日

宋史断

《宋史断》。

淮南道宋江张叔夜擒贼，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。

史臣断曰：叔夜者，天子之大恩，定罪者，君子之大法。宋江招京东诸郡，其罪戾死，此书“降”而不书“诛”，则是当时已赦之也。盖赦之初，非生罪为说也。又又失教于前，饥寒驱迫于后，而其才自其力，又不堪以郁郁让人，于是无端六章，一需群聚，姑亦存前，既亦存前，皆有之也。然其实谁教之失教，谁致之饥寒，谁致之有罪何力亦不得自见乎？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成汤所云，不其然乎？孰非常之罪不宥者？亦上既陷之，上又刑之，仁人在位，而民可为，即尧舜代天牧长之意也。故夫降之亦不诛，为天子之大恩，为天下之大法也。若在君子，则又不可不夫正其罪，而不书之曰赦者，君子非不知赦之初，非生罪为说，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，亦不互为说也。君子以为天子之职，在养万民，养万民者，安民之命，虽朝飞暮动，动莫上而生物之心，君子之职，在教万民，教万民者，爱长之心，惟一朝一夕，又谁置而为未之朝，故说之后，孰能不为之者，天子乃能出之汤火而置之社席，所谓九重之上，大开迁善之门也。乃说之后未之德无益者，君子先能图其奸而镇以重罪，所谓三尺之笔，真有雷霆之威也。盖一朝而赦者，天子之恩，百世不改者，君子之法。宋江召降而史书曰说，此《春秋》谨严之志，所以昭往戒，防未然，正人心，辅王化也。后世之人不察于此，而茫然于其外史，冠之以恩又之名，而又从罪罪罪称叹之，呜呼！彼何人斯，毋乃有乱虐之心矣夫。

张叔夜之击宋江亦降之也，《宋史》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？予之也。何予予张叔夜？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。何也？盖君子食君之食，受君之命，为君之地，牧君之民，则曰知某州。知之为官司其事也。若春未安，尔知其安；若春未育，尔知其育；饥者未食，尔知树畜；寒者未衣，尔知善养；劳者未息，尔知其息；病者未愈，尔知其愈；老者未教，尔知教之；贤者未举，尔知举之。夫如是，然后谓之不废其职。三年报政，而其若劳之，铭之以善书，赠之以鼓诔，死之以平次，试之以黄泥。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，非苟且亦已也。自言其政，亦尚食者多，民服田里，官亦不知；民垦若少，官亦不知；民多讼，官亦不知；民新升榜，官亦不知。如是，即不免重于监狱料死也。而固其城郭，官亦不知；固其水旱，官亦不知；固其粮粟，官亦不知；固其马匹，官亦不知。嗟乎！恨已一无所知，而又欺其君曰：“吾知某州。”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？《宋史》于张叔夜击降宋江，亦独大书知海州者，求予说之。

史臣之为此言也，是扶危厚言之者也。若夫官知某州，则莫何事不知者乎？关节，则知通也；机要，则知能也；催科，则知其能也；对簿，则知其能也；民产殷富，则知成德以化之也；史书秋谕，则知其能以化之也。其所不知者，诚一无所知。乃其所知者，且无一而不知也。嗟乎！嗟乎！一无所知，以不可以为官；若夫一无所知，亦且俨然为监手哉！诚安用张叔夜其人，以击宋江之金力亦施击之也！

《宋史目》：宋江起为盗，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，转掠十郡，官吏莫敢要其锋。知海州张叔夜上言，言知才力有太过人者，不若赦之，使以方腊以自贖。帝命张叔夜入，未赴而卒。又

命张叔夜知海州。江将至海州，叔夜使间者视所向。江溢超海滨，劫巨舟十余，数回获。叔夜募死士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，距海滨之战，先匿壮卒海旁，伺舟合，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贼，江乃降。

文臣断曰：观此而知天下之事无不可为，而特无为之人。夫当宋议以三十六人赴于河朔，特以十郡，而十郡官非莫之敢要也。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寒可憐，野火可扑者哉！一旦以朝廷之员，不啻张叔夜者耳。夫张叔夜，则就之十郡之长官耳，非膏粱又之赏物多，非威国家之知遇厚也者。且宋议，则亦非谓谁少十郡，而独恬于海州者也。然而前时受其劫者，无敢如何；后则一朝成捷，如风压卵者。此无他，十郡之长官，各有其妻子，各有其货重，各有其禄位，各有其性命，而转顾既多，大议不决，贼胆乘之，排乎掌及也。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，无货重可恃，无禄位可求，无性命可惜。所谓为与不为，嫌臣之害，济与不济，皆君之员，不过如是。而议宋议三十六人者，已悉焚其骨而投麾下。呜呼！史书张叔夜募死士得千人，天已知叔夜固为第一死士乎哉！《传》曰：“见危致命。”又曰：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”又曰：“我战则克。”又曰：“可以寄百里之命。”张叔夜有焉，岂不赫赫社稷之臣也乎！

侯蒙欲败宋江使讨方腊，一语而八失焉。以皇皇大宋，不能奈何一贼，而计出于故之使情。夫其特判曰“故”、曰“情”，其要正是温语求息，失朝廷之尊，一也。杀人者死，凌及者榜，法也。劫掠至于十郡，肆毒实惟不小，而辄与议款，坏国家之法，二也。方腊所劫州城，不用皇师震怒，而仰望扫除于操林之三十六人，莫当时之夫人，三也。请一城攻一城，以其两斗一傍，乌脚狱中无人不报此意而大笑乎？势将反款之合，而今猖狂愈甚，四也。成功者，天下豪杰之士拼其头颅献其体而后得之，今遂以为盗贼出身之地，使壮夫削色，五也。《传》言：“四邻多患，大夫之毒。”今更无人出手批难，为君解忧，而遂欲以留市为饵款之具，有负养士百年之恩，六也。有罪者可款，无罪者生心，从此无涯天下之水，七也。若谓其才有过人者，则何不用之未为盗之先，而明移之授为盗之后，当时宰相为谁，颠倒一至于此，八也。呜呼！君子一言以为智，一言以为不智，如侯蒙其人者，亦安可遽死官。哉！真得知不平，是知其不大陈公事，为世稷矣者哉！何罗晋中不述，就祖其说，而有《续水滸传》之愚札也。

读第五才子书法

大凡读书，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。如《史记》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，所以他于《游侠》、《佞倖传》特地着精神。乃至其余诸记传中，凡遇挥金杀人之事，他便唏嘘赞叹不置。一部《史记》，只是“缓急人所时有”六个字，是他一生著书旨意。《水浒传》却不然。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，只是饱暖无事，又值心闲，不免伸纸弄笔，寻个题目，写出自家许多惊心绣口，故其是非皆不落于圣人。后来人不知，却是《水浒传》上加“忠义”字，遂非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，正是使不相

《水浒传》有大段正经处，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，使人见之，真有犬彘不食之根。从来人却是不晓得。

《水浒传》独恶宋江，亦是所嫉秦魁之意，其余便饶恕了。

或问：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惊心绣口，题目尽有，何苦定要写此一事？

答曰：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，便有三十六样出身，三十六样面孔，三十六样性格，中间便结撰得来。

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，只要题目好，便书也作得好。

或问：题目如《西游》、《三国》，如何？答曰：这个都不好。《三国》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，笔下拖不动，竟不转，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，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，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。《西游》又太无脚地了，只是逐段捏捏撮撮，譬如大年夜放烟火，一阵一阵过，中间全没贯串，便使人读之，处处可住。

《水浒传》方法，都从《史记》出来，却有许多胜似《史记》处。若《史记》妙处，《水浒》已是件件有。

凡人读一部书，须要把眼光放得长。如《水浒传》七十回，只用一日俱下，便知其二千余纸，只是一篇文章。中间许多事体，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，若是拖长看去，却都不见。

《水浒传》不是轻易下笔，只看宋江出名，直在第十七回，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。若使轻易下笔，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，文字便一直帐，无擒放。

某尝道《水浒传》胜似《史记》，人都不肯信，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。其实《史记》是以文运事，《水浒传》是因文生事。以文运事，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，却要算计出一篇文章来，虽是史公高才，也毕竟是吃苦事。因文生事即不然，只是顺着笔性去，削高补低都由我。

作《水浒传》者，真是识力过人。某看他一部书，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，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，一也；三十六员天罡，七十二座地煞，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叛逆，显见逆天而行，二也；盗贼是宋江了，却偏不许他便出去，另又勾一尾盖盖住在上，三也；天罡地煞，都冒第二，不使出现，四也；临了收到“天下太平”四字作结，五也。

三个“石碣”字，是一部《水浒传》大段落。

《水浒传》不说鬼神怪异之事，是他气力过人处。《西游记》每到弄不来时，便是南海观音救了。

《水浒传》并无“之手者也”等字，一样人，便运他一样说话，真是绝奇本事。

《水浒传》一个人出来，分明便是一篇列传。至于中间事迹，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，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，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。

别一部书，看过一遍即休。独有《水浒传》，只是看不厌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，都写出来。

《水浒传》写一百八个人性格，真是一百八样。若别一部书，任他写一千个人，也只是一样；便只写得两个人，也只是一样。

《水浒传》章有章法，句有句法，字有字法。人家子弟稍识字，便当教令反复细看，看得《水浒传》出时，他书便如破竹。

江州城劫法场一篇，奇绝了；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，一发奇绝。

潘金莲偷汉一篇，奇绝了；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，一发奇绝。景阳冈打虎一篇，奇绝了；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，一发奇绝。真正其才如海。

劫法场，偷汉，打虎，都是极难题目，真是没有下笔处，他偏不怕，定要写出两篇。

《宣和遗事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，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。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，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。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，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。任凭提起一个，都似旧时熟识，文字有气有如此。

一百八人中，定考武松上十，时迁、宋江是一流人，定考下下。

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心地厚实，体格阔大。论粗卤处，他也有些粗卤；论精细处，他亦甚是精细。然不知何故，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。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，若武松真是天神，有大段及不得处。

《水浒传》只是写人粗卤处，便有许多写法。如鲁达粗卤是性急，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，李逵粗卤是蛮，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，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，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。

李逵是上上人物，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。看他意思，便是由酒中一百七人，无一个人得他眼。《孟子》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正是他好批语。

看来作文，全要胸中先有缘故。若有缘故时，便随手所触，都成妙笔；若无缘故时，真是无动手处，他便作不来，也是难怪。

只如写李逵，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，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，故便妙不可言。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，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，做个形击。

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，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。此譬如刺枪，本要杀人，反使出一身家数。

近世不知何人，不晓此意，却带出李逵书来，另作一册，题目“李逵文集”，可谓“咬人屎臊，不是好厨”。

写李逵色色绝倒，真是化工造物之笔。他都不必具论；只如逵还有兄李达，便定然排行第二也，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，直等急初中移名换姓时，反称作李二，谓之乖觉。试想他肚里，是何等没分晓。

任是真正豪杰好汉了，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。独有李逵，便银子也买他不得，须要等他自肯，真又是一样人。

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只是太狠。看他都得到，熬得住，把得牢，做得彻，都使人怕。这取人在世上，定做得事业来，然琢削元气也不少。

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，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，只是比宋江，却心地端正。

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，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，有军师之体。

吴用与宋江差处，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，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。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，吴用却又实实在实笼罩宋江。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，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，写得真是好看煞人。

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，写得恁地文秀。

阮小七是上上人物，写得另是一样气色。一百八人中，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，心快口快，使人对之，漏泄都稍尽。

杨志、关胜是上上人物。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，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。

秦明、索超是上中人物。

史进只算上中人物，为他后半写得不好。

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，然只是上中人物。

卢俊义、柴进只是上中人物。卢俊义传，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，然终不免带些呆气。譬如画骆驼，虽是庞然大物，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。柴进无他长，只有好客一官。

宋全与雷横，是宋全写得好。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。

杨雄与石秀，是石秀写得好。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，杨雄竟是中下人物。

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，备员而已。

李虎只是中上人物，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，写处全不见得。

阮小二、阮小五、张横、张顺，都是中上人物。燕青是中上人物，刘唐是中上人物，徐宁、董平是中上人物。

戴宗是中下人物，除却神行，一件不足取。

在最根人家子弟，凡遇读书，都不理会文字，只记得若干事迹，他算读过一部书了。虽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都作事迹搬过去，何况《水浒传》。

《水浒传》有许多文法，非他书所曾有，略点其则于后。

有倒插法。谓将后边要紧字，蓦地先插放前边。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，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，又武大娘子要回王千娘去看虎，又李逵去买枣糕，收得汤隆等是也。

有夹叙法。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，却不是一个人说完了，又一个说，必要一笔夹写出来。如瓦官寺禅道成说“师兄息怒，听小僧说”，鲁智深说“你说你说”等是也。

有草蛇灰线法。如景阳冈豹叙许多“哨棒”字，紫石倒连写若干“帘子”字等是也。譬看之，有如无物，及至细寻，其中便有一条线索，拽之通体俱动。

有大落墨法。如吴用说三阮，杨志北京斗武，玉婆说风情，武松打虎，还道村捉宋江，二打祝家庄等是也。

有痛钉泥刺法。如花荣要宋江开柳，宋江不肯；又扈三娘要下山，宋江番番劝住，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。笔墨外，便有利刃直戳进来。

有背面铺粉法。如要衬宋江奸诈，不觉写作李逵真率；要衬石秀尖利，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。

有草引法。谓有一段大文字，不好突然便起，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。如索超前，先写周谨；十分光前，先说五事等是也。《庄子》云：“始终青萍之末，盛于土囊之口”。《礼》云：“鲁人有事于泰山，必先有事于配林。”

有藏怪法。谓一段大文字后，不好寂然便住，更作余波说漾之。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，如县尉文彬升堂；武松打虎下冈来，遇着两个猎户；血战鸳鸯楼后，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。

有正犯法。如武松打虎后，又写李逵杀虎，又写二解争虎；潘金莲偷汉后，又写潘巧云偷汉；江州城劫法场后，又写大名府劫法场；何涛捕盗后，又写黄安捕盗；林冲起解后，又写卢俊义起解；宋全、雷横放晁盖后，又写宋全、雷横放宋江等。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，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毫一尽相借，以为快乐是也。真是浑身都是方法。

有略犯法。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，唐牛儿与邓母，那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，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。

有假不省法。如要写宋江犯罪，却先写招文袋金子，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，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借，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。凡有若干文字，都非正文是也。

有假省法。如武松迎入阳谷县，恰遇武大也搬来，正好撞着；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，连日被毁等是也。

有混合故纵法。如白龙庙前，李俊、二张、二童、二嫂等救船已到，却写李逵正要杀人城去；述道村玄女庙中，赵能、赵得都已出去，却有树根绊跌，王兵叫喊等，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。

有横云断山法。如两打祝家庄后，忽插出解珍、解宝争虎越狱事；又正打大名城时，忽插出戴宗鬼、抽襄樊谋财倾命事等是也。只为文字太长了，便恐累坠，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，以间隔之。

有冤股绕弦法。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，路遇杨雄、石秀，彼此须互不相识。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，彼此既同取小径，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？看他将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，先斗出巧来，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，捏出姓名来等是也。都是刻骨算得出来。

旧时《水浒传》，子弟读了，便晓得许多闲事。此本是点题得粗略，子弟读了，便晓得许多文法；不但晓得《水浒传》中有许多文法，他便将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书，中间但有若干文法，也都看得出来。旧时子弟读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书，都只看了闲事，煞是好笑。

《水浒传》到底只是小说，子弟极要看，及至看了时，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。

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，他便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书都肯不释手看，《水浒传》有功子弟不少。

旧时《水浒传》，版去皂隶都看；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，却是与小人没骨之书，必要真正有福绣心肠者，方解说道好。

贯华堂所藏古本《水浒传》前自有序一篇，今录之

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应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应更仕；五十不应为家；六十不应出游。何以言之？用违其时，事易尽也。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濯头面，剪申脚，进盘缠，嚼杨枣。诸事甫毕，起回可中。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期。一日如此，一万六千日何有！以此思忧，竟何所得乐矣！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，夫若干者，积而有之之谓。今其岁积在何许？可取而数之否？可见已往之身，悉已变灭。不宁如是，吾书至此回，此句以前已疾要矣。是以可痛也！快愈之事莫若友，快友之快莫若谈。其谁曰不然？然亦何曾多得。有时风寒，有时泥雨，有时卧病，有时不值，如是等时，直往牢狱矣。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种秫米，身不能饮，吾友来需饮也。舍下门临龙河，嘉树有荫，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。舍下执炊爨，理厨锅者，仅老婢四人；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，便于驰走理送，传接篇贴也。舍下童婢稍闲，便课其缚帚织席。缚帚所以扫地，织席供吾友坐也。吾友毕来，当得上有六人。然而毕来之日为少，非甚风雨，而尽不来之日亦少。

夫幸日以六七八人来为常矣。吾友来，亦不便饮酒，欲饮则饮，欲止先止，各随其心，不以酒为乐，以谈为乐也。吾友谈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遥，传闻为多。传闻之言无实，无实即庸浅乖谬矣。亦不及人过失者，天下之人本无过失，不虞吾诋谮之也。所发之言，不求惊人，人亦不惊；未尝不被人解，而人罕亦不能解者，事在性情之际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尝闻也。吾友既皆绣襖通衢之士，其所发明，四方可遇。然而每日言毕即休，无人记录。有时亦思集成一书，用贻后人，而至令阙如者：名心既尽，其心多懒，一；微言求乐，著书心苦，二；身死之后，无能谈人，三；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，四也。是《水浒传》七十一卷，则吾友散后，灯下戏墨为多；风雨甚，无人来之时半之。然而经营于心，久而成习，不必伸纸执笔，然后发挥。盖薄莫冥落之下，五更卧被之中，垂首拈髭，眯目观物之际，皆有所遇矣。或若问：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，云何独有此传？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，不成无损，一；心闲试弄，舒卷自恣，二；无贤无愚，无不能谈，三；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，四也。呜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？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读之而乐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？吾又安所用其眷恋哉！东都施耐庵序。